



王连芳传

高苏平◎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王连芳传

高苏平◎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王连芳传 / 高苏平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222-10678-9

I. ①王… II. ①高… III. ①王连芳—传记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3606号

责任编辑：张 波

装帧设计：杨晓东

责任校对：杨雅然

责任印制：洪中丽

书 名	王连芳传
作 者	高苏平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排 版	云南省人大办公厅印刷厂
印 刷	云南省人大办公厅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222-10678-9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绪言：笔者眼中的王连芳同志 / 1

- 一、长大要做安中根 / 12
- 二、二哥王连壁 / 19
- 三、表叔刘格平 / 26
- 四、归队的“老革命” / 35
- 五、王连芳与马本斋 / 46
- 六、英勇善战的回民支队 / 57
- 七、回救总会的王主任 / 67
- 八、八路军队伍里的阿訇 / 76
- 九、王连芳与刘佩忱 / 86
- 十、战友和良师 / 97
- 十一、边区的一挺机关枪 / 104
- 十二、鬼子监狱里的 82 天 / 111
- 十三、伴随一生的阴影 / 126
- 十四、迎接新中国 / 132
- 十五、巨大的关怀 / 141

- 十六、小平同志的嘱托 / 147
- 十七、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到云南 / 159
- 十八、创办云南民族学院 / 169
- 十九、最佩服的是宋任穷同志 / 177
- 二十、“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与“直接过渡” / 186
- 二十一、为了各族人民当家做主 / 197
- 二十二、“大跃进”和“大前进” / 206
- 二十三、王连芳眼中的谢富治 / 213
- 二十四、阎红彦的胆识 / 225
- 二十五、“文革”中的王连芳 / 233
- 二十六、平反“沙甸事件” / 240
- 二十七、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的争论 / 251
- 二十八、写给总书记的信 / 257

参考文献 / 267

绪言：笔者眼中的王连芳同志

我不是什么英雄、模范，不需要树碑立传。我只是一个幸存者，一个老兵。当然，我这辈子也有几件值得骄傲的事，一是接受革命思想、参加组织比较早，那时只有13岁；二是从地下工作到战争年代，从鬼子的监狱到“文革”中身陷囹圄，信念从未动摇过；三是不唯书、不唯上，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2000年2月13日王连芳于病房

电影《回民支队》是笔者从小就十分喜爱的一部抗日题材影片，抗日英雄马本斋和只有一条胳膊的郭政委曾给少年时代的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1983年王连芳同志到云南省人大担任常委会副主任后，听一些同志说他在抗日战争中曾经担任过回民支队的政委。说实话，我当时很难把他与心目中的那个只有一条胳膊的郭政委联系起来。1984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我认识了王连芳同志，可能是我发表的一篇关于民族立法问题的探讨文章引起他的注意，不久我被组织上安排做了王连芳副主任的秘书。工作关系使我有机会去认真地观察自己昔日的偶像，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开始了解王连芳同志，走近王连芳同志。

在王连芳同志身边工作的四年很辛苦，他的脑子从来就不休息，总是不断提出问题要你思考，不停地要你把他的思维形成文字。四年间他先后出版了30多万字的两本专著，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20多万字的文章。四年中他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云南省的各个地、州、市。王连芳同志的心脏不好，出远门总要带着氧气袋，有几次他在外省开会时犯了病，笔者还陪着他在北京、西安、

郑州住过医院。王连芳同志的随和与平易使人很难把他当省一级的大领导，他的民主作风和宽容大度让人愿意畅所欲言，甚至表达不同意见。特别是对于下属，他父辈长者式的关爱会让人自然而然产生亲近感。尽管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化翻天覆地，但在他身上还保留着一种少年般的纯真，一种书生般的痴迷。他的讲话、谈话往往没有多余的粉饰，直入主题、言之有物、议论深刻，让人受益匪浅。与王连芳同志十余年相处，对他了解得越多，我对他的敬重和折服也越多。在他的身上我不仅看到了心目中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风采，更值得珍藏的是他那种精神、那种品格、那种力量。可以说，王连芳同志是我人生道路上的老师。如果高攀的话，也可以说是忘年之交的老朋友，是那种可以倾诉、交心而无须忌口的老朋友。

王连芳同志在思想尚未成熟的少年时代就参加了革命，并在我们通常所说的革命大家庭里度过了整个人生，在他们那一代早年参加革命的人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他13岁就开始做地下工作，18岁就担任了抗日政权的县委宣传部长，20岁就当上了回民支队的政委，22岁就当选为冀鲁边区行政委员会常委，27岁就担任了华北第一个被解放的城市沧州市的副市长。在残酷的战争岁月里，他经受过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考验，体现了一个军人和共产党员的价值。打下江山后，他31岁来到云南边疆，为各族人民工作了整整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王连芳同志所面对的虽然是与战场完全不同的复杂情况的考验，但那些无休止的“路线斗争”和“政治运动”并不亚于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而面对这些考验同样也需要实事求是的无畏精神，需要敢于逆流而动的勇气，需要军人式的英雄气概。“文化大革命”期间，王连芳同志被打成“叛徒”、“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受到残酷迫害和折磨，并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女儿。但他并不后悔，因为在他踏上这条荆棘丛生的人生之路时，他就做好了为人民而牺牲一切的思想准备。人老了，在生理上必然会老化，也必然影响到心理，会僵化，这是无法抗拒的。但是老化和僵化却因人而异，至少在王连芳同志身上看不出来，他常常自讽“不知老之将近也”，仍然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仍然在做着过去想做而

没有做完的事。今天，王连芳同志已经离世十多年了，盖棺论定，可以说是少年时代纯真的革命理想和为各民族人民无私奉献的坚定信念覆盖了他的整个人生轨迹。

王连芳同志对自己生活上的要求不高，他不吸烟、不喝酒，除了严格遵守回族的饮食禁忌外，其他什么都可以吃。为街头摊贩烤红薯的香味所诱惑，他会像孩子一样迫不及待买上一个躲在路边大快朵颐。他自掏腰包请在北京的几位老战友、共和国的将军和部长们吃饭，吃的也不过是一人一碗羊肉泡馍和糖醋泡蒜等四碟小菜。笔者的烹饪技术尚佳，偶尔遇上他老伴不在家时也会给他做上几顿北方人爱吃的韭菜合子、馅饼等饭菜，他吃后总是赞不绝口。直到老人病危几天未进食时，还提出要吃笔者做的韭菜合子。

王连芳同志对子女的要求一向十分严格，虽然身为领导干部，又在云南工作多年，他的儿女亲家和老部下中也不乏省级领导，完全有条件为子女的工作选择发挥一点儿影响，但他从未因儿女的事找过任何人，动用过任何关系。他共有五男二女七个孩子，除了一个女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自杀外，没有一个在党政机关或福利待遇较好的企业工作。198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要求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不准利用领导干部的影响和关系经商办企业。王连芳同志在力劝其子退出领办企业未果的情况下，两次给省委写信，希望由组织出面切断其子所办企业与挂靠厅局的关系，以此来制止儿子继续经商办企业。他的几个孩子都是普通工人，前些年，企业不景气，他们也同其他工人一样下了岗，拿着失业保险。对于孩子们的前途，他同老伴儿商量过，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交代过：“让他们和普通群众的孩子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在笔者眼里，王连芳是个“官”，可他却始终没有学会做“官”。

对待各民族干部群众，王连芳同志却施以火一般的热情。他以共产党人的远大目光、坦荡襟怀、博大爱心，以诚相待、以心相交，同许多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原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刘树生同志，从抗战时期起就跟随

王连芳同志工作，1949年他们一同调入北京，1950年又作为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团员随王连芳同志来到云南。他在《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一书的《序言》中说：“连芳同志不仅是我的同乡、战友、上级，更是我的师长。在人生旅途中，我得到他的许多关心和有益的教诲。在我遇有困难时，总是得到他的强有力的支持、帮助”。

原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佤族干部保洪忠曾是佤族班老部落的头人，父子两代都与王连芳同志相交甚深。1951年省里安排保洪忠去北京参观学习，回来后在座谈会上他诚恳地向王连芳同志表示：“今后要听你们这些汉人的话，跟着汉人走”。王连芳同志恳切地告诉他，我和你一样也是一个少数民族，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保洪忠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副主任和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每次到昆明都要专程看望王连芳同志。两人见了面相互问候完就坐在那沉默不语，王连芳同志请他喝茶，他喝口茶，让他抽烟，他抽支烟，问他一句，他答一句。说点什么事，永远是那句话“我听你的”。每次坐够了半个小时，保洪忠总是一句话：“我下次再来看你。”下次来了，仍然如故。目睹了几次这种奇怪的交流方式，我忽然意识到，有时候，沉默也是一种情感交流的方式，也是一种信任和依赖。

原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长、后来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和才在哈尼族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与王连芳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成为至交挚友。“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与王连芳同志一起被发配到昆明百花山农场劳改，他俩一个放羊，一个看包谷，年龄虽然相差27岁，但几十年的合作共事，结为忘年之交。他俩生病住院期间经常要到对方的病房里坐坐聊聊。李和才临终之前还拉着王连芳同志的手倾吐心声，表示自己一辈子跟着共产党走不后悔，希望组织上继续教育培养好他的子女，让他们也像自己一样永远跟党走。

基诺族干部何贵，原是一个哈尼族头人家里的奴隶，走上革命道路，后来成为省边委民族工作队队员。在民族工作队的四年时间

里，何贵得到王连芳同志的关心和培养，逐步成熟，走上领导岗位，先后担任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常务副州长、州委副书记、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创造了基诺族干部在州里的多个第一。他曾多次表示，自己就是王连芳同志手把手教出来的少数民族干部。

王连芳同志为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倾注了毕生心血，以至他为民族干部办过的很多事自己也记不清了。一次，王连芳同志生病住院，一位他不认识的着傈僳族服装的老太太提着水果来看望。王连芳以为是有事要他帮忙，便叫秘书倒茶接待，可老人放下东西，问候了几句就走了。秘书送老太太下楼时，老人流着眼泪说，她原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的傈僳族干部，1958年“反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中因为说了几句过头话，便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刑劳改，在劳改队里，她听人说自己当年在云南民族学院学习时的老院长王连芳正在怒江出差，抱着一线希望给王连芳同志写了一封求救信，并反复叮嘱儿子一定要把信交到王连芳同志手上。后来信送到了，王连芳同志详细了解了她的案情，严肃批评了负责办案的有关部门，很快她就被解除了劳改，恢复了工作。如今她那个送信的儿子已经担任了省民委处级干部，退休后她也来昆明养老，她们全家人永远忘不了王连芳同志的恩德。

还有一次，王连芳同志在西双版纳州开会，突感心脏不适，很快就被送到当地医院治疗。在医院的检查和治疗过程中，院长始终不离左右，跑前跑后地招呼。中午也没有人交代，院长就安排人从外面的清真饭店要来了北方人爱吃的饭菜。王连芳同志病情缓解要离开时，他又送来备用的药品、灌满的氧气，并安排医护人员送王连芳同志回宾馆。秘书深怀感激去结账，回答是院长已经交代过一分钱也不能收。秘书找到院长询问，这位院长激动地说：“王老已经记不住我了，我却一辈子忘不了他。”原来60年代初，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云南西双版纳州工作，在来云南的飞机上正好与在京开会后返昆的王连芳同志邻座，当王连芳同志了解到他是学医的，又要到边疆工作后，非常高兴，一路上不断向他介绍版纳州的情况，并嘱咐他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希望他能为缺医少药的边疆人民服务一辈

子。到昆后，王连芳同志安排他住在省民委招待所，当天晚上又叫上他一起陪同来昆开会的版纳州领导吃饭，并安排他搭州里领导的车去景洪报到。出发时王连芳同志又亲自去送他，并一再嘱咐：以后有困难、有问题，可以给我写信，也可以直接来找我。就这样，几天亲密的接触，几句关怀的话语，几声热情的鼓励，让一位来自内地的知识青年扎根边疆，为边疆人民奉献了自己的半生。最后这位院长还委托秘书转告王连芳同志，他还要继续履行当年对王连芳同志许下的诺言，为边疆人民服务一辈子。

对各民族的普通群众也是这样。有一回，王连芳同志下乡去滇南，汽车路过一个回族村庄，正好赶上饭点儿，就准备在村口的清真饭馆吃饭，可能是饭馆的主人认出了王连芳同志，一面安排人准备饭菜，一面急匆匆回到村里，一会就领来了一位回族老人和他的儿孙。老人自豪地向王连芳同志一一介绍了自己的家人，随后送上两大包茶叶，说这是刚刚采收的春茶，给王主任尝尝新。秘书要付钱，老人坚决不收，只是反复念叨着一句话：“没有王主任的帮助，就没有我们一家人的今天。”由于匆忙，当时没来得及问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事后王连芳想了很久也想不起来。

可以说，王连芳同志对少数民族的关爱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有人同他开玩笑，请他细数出几位当今著名电影演员的姓名和作品，他几乎一个也说不出。可是电影艺术家中有哪几个是少数民族，出演过哪几部影片他却清清楚楚、娓娓道来。

从一线岗位退下来后，年纪大了，时间多了，王连芳同志的思乡之情也越来越强烈，他曾经多次借赴京开会之机回到老家沧州。每次回去总要看望一下当年回民支队牺牲的烈士遗属。每到一家，他都要嘘寒问暖，同烈士亲属们一起回忆、一起流泪。遇有困难和问题，他都会要求陪同的当地领导帮助解决，临走时还要从自己的工资和稿费中拿出一些钱，对战友遗孤们表示点心意。笔者多次亲眼目睹过那些令人潸然泪下的场景。一次为了回民支队一位牺牲的同志优抚政策没有落实，他当场向陪同的当地领导发了脾气，回到招待所一个人关在屋里生闷气，甚至拒绝出席县委、人大和政府为

欢迎他而安排的晚宴，直到县里领导出面表态马上给予解决才算。那些年，王连芳同志经常会收到战友离世的讣告。每一次他都会拿着电报沉思许久，目光中透出深深的怀念与不舍，然后述说一遍这位同志的生平事迹，自己动笔写好唁电，有时还要安排秘书给那些家在农村或基层的战友家人寄一些钱。

沧州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对革命的支持让王连芳同志心怀感激，永生难忘。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连年天灾人祸，全国各地饿死的人很多。王连芳的老家河北沧州也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沧州地县级机关的干部由于营养不良，许多人得了浮肿病，机关的正常工作已经难以保证。情急之下，沧州地委的领导找到王连芳同志寻求帮助。当时云南的粮食状况已略有好转，对家乡的情况，王连芳同志从来往的家书中已有所了解，并为家乡父老的疾苦而伤心落泪，他在不违反国家粮食政策的条件下，多方筹措，帮助购买了8万斤玉米，经越南的海防港海运至沧州。当时的8万斤粮食可不是小数字，这些粮食缓解了沧州地县级机关干部燃眉之急，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对王连芳同志的这一帮助，家乡的父老没齿难忘，笔者曾两次随王连芳同志去沧州，地市机关的老同志提及此事，都十分激动，称当初若不是王同志帮忙添补的这点粮食，真不知会出现什么后果。

每一个穆斯林一生之中，如果条件许可应该前往克尔白朝觐一次。每年伊斯兰历的十二月上旬，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远离家乡，成群结队，奔向日夜思慕的麦加，虔诚受戒，脱去常服，以白布遮身，环绕“天房”克尔白，亲吻黑石。作为一个回族干部和云南省伊斯兰教协会名誉主席，晚年的王连芳同志也想去麦加看看。在此之前，王连芳同志除了曾经应香港大学的邀请去讲学，介绍云南的民族工作历史外，他一生唯一的一次出境就是去沙特的麦加副朝（伊斯兰教历正式朝觐时间外，其他时段的朝觐称“副朝”），当然在副朝时他也没有忘记为自己身后之事准备了三丈六尺白布。

老同志们在一起谈论后事，总要说去见马克思作个交代。作为一名回族干部，王连芳死后要去见谁？2000年1月，知道自己的生



1996年王连芳同志赴沙特阿拉伯副朝时的照片

命即将走到尽头的王连芳同志，把笔者叫到医院，坦言其身后按照穆斯林的方式办理，并嘱为他选一块墓地。笔者联系昆明市政府的有关领导，他们很支持。王连芳同志一生很欣赏曾为云南的发展和民族关系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元代著名回族政治家赛典赤·瞻思丁，所以我们先看了西山区松华坝水库下方公路旁的赛典赤墓。墓地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绿色护栏围绕一个占地约两亩的小山包，苍松翠柏掩映。可惜周围全是低洼的田地，如果在此选址，一则反差太大，二则地势太低，另外也不便管理。最后只好在昆明市的回族公墓单独选择了一块墓地。2000年2月23日，王连芳同志这位为党的民族工作奋斗了67年的回族共产党员，这位用一生去追求和实践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回族革命者，按照穆斯林的葬礼仪式，用自己朝觐麦加带回的三丈六尺白布裹着遗体入土，头朝北，面向西，向着遥远的圣地麦加，向着穆斯林尊贵的天房——这是每个穆斯林身后的崇高愿望，也是一个回族老共产党员的最后归宿。

说到信仰，在今天这样一个物欲横流、文化多元的社会里，有

很多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尽管现在有人标榜自己的信仰多么坚定，但其所作所为却往往难以自圆；也有不少以标榜自己什么都不信，什么都看淡为时髦的人，但他们骨子里透出的却是酸酸的醋意。从王连芳同志60多年革命生涯的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到，信仰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汇，而是一桩桩感人的事例，是一个个叠加的坚信，坚信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最崇高的，坚信为此贡献一生是最大的幸福。笔者之所以命名本书为《大爱》（后接受出版社编辑的意见改为《王连芳传》），是因为王连芳同志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心交给了各族人民，并像爱自己的亲人一样热爱各族人民，成为一名真正的民族公仆；是因为他身上具备了许多平民百姓心目中一个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应该具有的品质，清廉朴素、公正刚直，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特别是在过去那些“左”的年代，他敢言别人不敢言，不为尊者讳，不为时局讳；是因为他对各族人民刻骨铭心的热爱，对党的民族工作事业披肝沥胆的忠诚，并为之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一直到死。作为老一辈民族工作者，他在事业上、工作中展现出来的凝聚力、亲和力和感染力，并非是天然形成的，而是来自一个共产党人的底气。因此，可以说王连芳同志以他的人格和品德给共产党员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标准的、无法撼动的标杆，为我们这些后来人留下了永远的感动和启迪。

一个人回顾历史时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很不容易。王连芳同志曾郑重地对我们说过：“我这一生可以说是无怨有悔的。”这句话让笔者至今难以忘怀。究竟“悔”从何来？他曾说过：“抗战时期，我在处理冀鲁边区的民族、宗教问题上曾有过操之过急的教训，为此曾经引起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过问。”他也说过：“过去很多人都说我‘右’，其实现在想想，我也有过‘左’的地方，也有不敢讲真话、讲实话的时候，只不过是比那些极‘左’的人稍微‘右’了一点。比如1958年省委要求在黑林铺举办学习班，把边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地区和‘直接过渡’地区的少数民族上层集中起来学习，进行‘补课、整风’，我作为省边委副书记兼民委副主任主持学习班的工作。那次学习班上，迫于上级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压

力，我也说了一些违心话，给许多少数民族上层带来很大的压力。后来，还是新到任的省委书记阎红彦同志及时干预纠正的。事后阎红彦同志代表省委承担了全部责任，并公开向少数民族上层们道歉，我也在各种场合向他们赔过不是”。王连芳同志还说过，建国以来，自己长期担任省边委和民委的领导职务，压住了两部门很多有能力、有水平的民族干部，使他们长期得不到提拔使用，自觉很对不起大家。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有悔”之处，笔者不得而知。

对王连芳同志，与他共事了近60年的原云南省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刘树生同志曾作出评价：“王连芳同志长期从事民族工作，可谓是云南民族工作的专家。他既是云南民族工作的参加者，也是云南民族工作的领导者，既有参加云南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体验，更有对云南民族工作全面正确的把握和理解”。对于王连芳同志的一生，刘树生同志则高度概括为：“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性，对事业孜孜不倦执著追求的精神，在原则是非面前敢于坦诚直言的风格，对同志火一般的热情和对各族人民深厚的感情，对工作认真负责、精益求精、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以及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生活作风，都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云南省民族工作的老领导马曜同志也曾评价王连芳同志：“他有三个最大的优点是许多从事民族工作的其他同志所不及的。第一，50年代后期至1976年，在民族工作上，敢于逆潮流而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从开始工作到卧病在床，60年来一直未离开民族工作，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献给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事业，无时无地不为少数民族着想。‘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可谓难能矣！第三，连芳的主要精力用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以致建国后回民问题在云南内地尤为突出，连芳作为新中国回族的代表人物之一，对解决云南建国后由于执行政策错误发生的‘沙甸事件’等一系列的回民问题，立下了不可替代的功绩”。

抛开政治立场，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像他那么多让人咂舌的经历，生前身后能得到他人的这些评价，已经足可以称作传奇了。随

着对王连芳同志的深入了解，他战争年代和建国以后的传奇经历，他从事民族工作60年的艰辛道路和一个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使我对王连芳同志产生了浓厚兴趣。在王连芳同志身边工作时，我曾不断地引导他讲述自己的过去，并努力从中梳理出了一个我感兴趣的清晰轮廓。1986年夏天，我利用回济南探亲的机会，在山东省图书馆查阅了1944年创刊到1950年停刊的《渤海日报》，这是一份由当时渤海区党委主办的4页4开机关报，从中收集到王连芳同志当时战斗生活的海量信息。笔者还利用两次随王连芳同志回沧州的机会，在孟村、盐山、黄骅等地走访了部分健在的老同志；利用在宁夏出差之机，拜访了在当地工作的20多个王连芳同志的老战友和部下；翻阅了他从1950年起记录的240多本工作笔记。随着轮廓的逐步清晰，笔者产生了把它们记录下来想法。当初，我流露出为他写个传记的想法时，王老对我讲了开篇时的那段话：“我不是什么英雄、模范，不需要树碑立传。我只是一个幸存者，一个老兵。当然，我这辈子也有几件值得骄傲的事，一是接受革命思想、参加组织比较早，那时只有13岁；二是从地下工作到战争年代，从鬼子的监狱到‘文革’中身陷囹圄，信念从未动摇过；三是不唯书、不唯上，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我们经常说，要“以史为鉴”，而为鉴的历史必须是真实的历史，是不粉饰、不隐恶，秉笔直书的历史。的确，我们的党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和辉煌的战斗历程，但是也应当正视那些经验中的教训，正视那些辉煌之下的阴影，这些也同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笔者之所以想为王连芳同志写个传记，目的即在于此。

一、长大要做安中根

我从小就从父兄那里懂得了，我们和日本鬼子不共戴天……要赶走日本鬼子靠谁？……后来从二哥王连壁和刘格平同志那里，才知道了共产党和红军是要抗日的，不当亡国奴就要跟着共产党。所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一起把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推到共产党的旗帜下。

——王连芳

出北京向东南，沿着古老的大运河前行400多里，就到了河北的沧州市。说起沧州，不少人脑海中会浮现出《水浒传》里描写的那个“荒原漠漠、风雪漫漫的边裔之地”。实际上书中的描述与历史上的沧州并不完全吻合。这里北靠京津、东临渤海、南扼山东、西连中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沧州的盐业自汉代起便驰名天下，特别是在王连芳的老家盐山县，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即设县。“万灶青烟皆煮海，一川白浪独乘风”，描绘的就是当地盐业生产的盛景。由于运河纵贯全境，便利的水运使沧州得以迅速发展，并出现过“工商如云屯，行舟共曳车。漕储日夜飞，两岸闻喧哗”的繁华盛景。

政治上庸碌无为的宋徽宗把沧州作为囚犯们的流放地，而雄才大略的元世祖忽必烈却看中了它扼守津南门户，控制漕运水道的战略地位，派出了来自中亚塔什干的回纥爱将王葛思率部镇守。就这样，今天沧州地区运河两岸40多万穆斯林的先祖们在这里扎下了根。秦汉以来的历史，给中原统治者最深刻的教训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骁勇善战，于是靠“高筑墙”起家的朱元璋，确定了以防御为主